

身份塑造：社会期待桎梏下女性的身份认同与性别困境

——从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和《我的姐姐》说起

潘琪

摘要 | 传统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利好男性，为女性塑造了多重身份并致以极大的社会期待，女性在多重身份的束缚下承受着巨大压力，男性的优越地位放大了这种性别困境。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和中国电影《我的姐姐》呈现了多重身份重压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发现，只有当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男性树立平等尊重观念、社会文化风气与氛围改变才是女性突破困境的未来出路。

关键词 | 身份认同；女性；性别困境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019年10月，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后，片中涉及的“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等主题，引发了观众的巨大舆论讨论浪潮。这部影片直击“职场歧视”“重男轻女”“产后抑郁”等尖锐社会难题，许多女性观影后直呼“感同身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但观众对影片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一方面是高评分与良好口碑，另一方面该影片却遭到韩国部分男性的强烈抵制，这真切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女性议题的极高关注，以及女性群体面临的切实生存困境问题。

2021年4月，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以探讨姐姐

安然对“追求个人理想和承担抚养弟弟责任之间矛盾”的中国电影《我的姐姐》上映，并获得极高票房。这部影片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姐姐”这个具有母性光辉与传统牺牲精神的女性角色的探讨。在传统的社会期待与身份桎梏的捆绑之下，“姐姐”安然勇敢地冲破家庭观念的层层封锁、从而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行为，击中了众多为家庭做出牺牲的中国式“姐姐们”的内心。

近年来，许多聚焦女性生存困境的作品不断涌现，例如直面“重男轻女”社会痛点的都市家庭伦理剧《都挺好》、关注女性生理需求的电影《送我上青云》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呈现

女性 in 多重身份塑造的困境下，在社会期待与条条框框的规则中，追求自我身份认同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艰难与努力。

一、多重身份枷锁：女性的身份认同困境

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个文明。”^[1]

男性不需要自称是某种性别的人，因为他是主体，他就是男人，而女人则是“他者”。社会为女性塑造了多重身份：女儿、妻子、媳妇、母亲，同时对她们抱有极高的期待：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温顺贤良……社会为她们塑造了层层的角色嵌套，要求她们遵循特定的角色准则、达到社会期待的标准、承受社会施加的压力。女性生活在社会对她的“定义”中，而这个符合社会期待和传统文化要求的“女人”可以是所有人，唯独不是她自己，作为女性本体的自我被抹杀和湮没了。

在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塑造的女性角色，承受着多重压力。在原生家庭中，她是小透明一般的存在，这是存在于所有重男轻女家庭中的不受重视的女儿的角色；在职场中，金智英拥有高等教育背景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但却仍然身处职场的边缘地带，在公司轻视女性的氛围中默默忍受不公；生育后，金智英和千万职场中的母亲们一样，选择牺牲自己的事业，离职成为了家庭主妇。

这部影片主要以暗色调的画面和压抑的节奏来呈现金智英的家庭生活：无止境的琐事杂务、缺少个人活动时间、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与未来出路……毫无疑问，金智英是称职的，她符合父权社会强加给她的所有期待——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但是她却身心俱疲、充满迷茫，枯燥繁琐的家庭事务与零散破碎的回忆显示出她的压抑，她被困在层层的角色中丢失了自我、缺失了灵魂。

在影片《我的姐姐》中，女主角安然呈现

的是女性角色构建中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姐姐。传统的儒家伦理有着“长姐如母”的观念，“姐姐”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代表一种责任与牺牲。电影中最激烈的矛盾是以舅舅、姑妈、大伯父等为代表的大家长以所谓“姐姐的责任”对安然进行捆绑，希望她放弃自己的人生规划，以抚养弟弟长大为己任。但安然始终以不牺牲自己的人生为信念与亲戚们斗智斗勇，毫无疑问，安然不想成为“中国式姐姐”，不想钻入既定的、具有牺牲精神的姐姐“套子”中去。与安然相反，安然的姑妈是典型的中国社会中的姐姐角色，她有着母性光辉，一切以为家庭、家人服务为主旨，她有着中国传统女性角色的一切美好特质，勤快、任劳任怨。姑妈身处社会塑造的角色牢笼而不自知，她成全了所有人，唯独她自己。

《我的姐姐》中一位患有子痫却为了生儿子不顾自己性命的孕妇也是典型的女性角色牺牲品。父权制社会期望女性能够生育儿子，而她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她是“合格的”，却也是可悲的。社会期待将女性困囿于家庭的围城，要求她们服务于家庭，抹杀她们的自主意识、个体需求与个人价值，她们永远是利他的，缺乏自我认知与审视。

二、男性优越地位放大性别困境

在两部影片中，两位女主人公都深陷于性别困境的泥沼之中，但这一结果却并不是由某一确切的角色造成的，甚至金智英有着来自丈夫、母亲、同事的支持。女性悲剧命运依旧存在，是因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与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偏向男性，男性是受益者，女性是牺牲者，在这种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下，男性优越地位的凸显无形中将女性的生存困境放大了。

波伏娃认为，男人是幸运的，社会要求他们承担责任，这条路十分辛苦，但是可靠；而为女人则提供一条温柔轻松的道路，她们被诱惑包围，

[1]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第二卷）》，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309页。

不被要求奋发向上。男性哪怕生来资质平庸，社会依旧对他寄予厚望；而女性哪怕再优秀，社会也会剥夺她的成长资源，有时候甚至反过来指责她“不够努力”。在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的“捧杀”中，男性日益自信勇敢，而女性则更加敏感卑微。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平庸的丈夫可以工作养家，因为社会赋予男人养家的职责，而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金智英只能被迫回归家庭，因为社会要求女性做好照顾家庭的本分；在职场中，同期入职的普通男同事的晋升，比优秀的女同事更快，再能干的女强人在高层晋升的玻璃板前，也只能望而却步；金智英的爸爸只给儿子买补药，而从来不会想起女儿，因为在他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中，男孩是第一位的，女孩次之。在这种带有性别偏见的社会风气中，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依旧步履维艰。

在《我的姐姐》中，弟弟安子恒嚣张跋扈、顽皮淘气，却因占据性别优势，被一众亲戚理所当然地要求安然牺牲个人前途；安然父母生前对弟弟极尽宠爱，对安然则不闻不问，家中甚至没有安然的照片；念中专的安然爸爸让学习俄语的姐姐让出学习机会……这些性别境遇对比是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社会文化系统造成的结果。在这种由社会惯性所带来的秩序结构下，没有价值创造说、天赋异禀说，只有性别一锤定音，女性的利益天然让渡男性，这是对女性权益的抹杀与歧视。

尽管影片中男性角色没有直接造成女性角色的生存悲剧，但他们确实是父权体制下的直接受益者。整个社会偏向男性而忽视女性的利益，很多时候女性拼尽全力争取的平等发展机会，于男性而言却是与生俱来的基本要求。他们不需要争抢，社会优质资源的天平天然偏向他们，而女性往往为这基本机会的争取已经耗尽了全力，再无精力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于是，“女性不如男性”“女性只适合待在家里”的观点甚嚣尘上，犹如西西弗斯的神话一般周而复始，实现男女平权，任重而道远。

三、权益呐喊：女性的身份自救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今社会，既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始终利好男性，女性成为他者、附属品——男性的附属品、孩子的附属品，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成为被剥削对象，是男性利益、家庭利益的牺牲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经济独立的实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捍卫自己的权益。在两部影片中，两位女主人公都有自我意识的觉醒，相比而言，金智英是隐蔽的抗争者，而安然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反叛者。

在影片中，金智英身受几座大山的压力重担，使得她的抗争更加隐蔽与犹豫。长期接受的女性身份教育让金智英循规蹈矩地走上相夫教子的道路。她几经挣扎终于决定出去工作，但在婆婆的压力以及长期与外界脱节而产生的自卑心理的作用下，她放弃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在家庭的枷锁和重担的压力下，她不断地挣扎着，精神分裂的人格是她身体发出的求救；在咖啡馆对上班族的激烈反驳是长期精神重压下的情绪爆发；重新拾起自信返回职场，是她对美好生活与寻求自我价值的向往。社会机器滚滚向前，渺小的个体不断挣扎起伏，她们都企图寻求属于自己的价值曙光。

相比金智英而言，安然的抗争来得更加激烈、更加彻底。由于长期接收不到来自父母的爱的反馈，安然不必受到亲情的捆绑；父母的突然离世，为安然冲破身份桎梏的阻拦减少阻碍；高等教育经历与独立的经济能力，让安然有底气激烈、决绝地摆脱姐姐身份的束缚，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之路。安然的请求是合法权益也是正当诉求，但是在讲人情的中国社会显得格外的格格不入与不近人情。人们总是容易被各种关系捆绑裹挟而逐渐失去自我，安然则是以理性的心态、个体间的独立方式划清界限、公事公办，但这种行为在有着浓厚男轻女思想的中国社会，简直是冒犯大不韪的禁忌。女性的自由与自主意识应该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安然最后选择抚养弟弟，似乎是对传统责任的妥协，但这是安然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裹挟的强迫与身不由己。

毛尖曾说，“善良”一旦作为“套路”，就

成为鲁迅所谓的“庸人设计”“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1]。反言之，责任一旦成为枷锁，女性就成为带着镣铐跳舞的人。两位女主角深陷身份与性别泥沼，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性别不公，这是她们在身份牢笼中发出的自救与呐喊，抵制着无处不在的剥削女性的“平庸之恶”。男女平等，首先体现为女性拥有选择的自由。

四、反思：女性身份困境的未来路径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旨在反映社会问题而不是解决社会问题。两部影片从不同的个体与文化出发，呈现了当今社会女性生存的严峻处境。女性争取权益并不是为了撼动或者超越男性权益，而是争取作为人的正当的、基本的权利。日本著名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权主义（Feminism）绝不是想要女性变得像男性那样，也不是弱者想变成强者的思想，女权主义寻求的是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被尊重的思想。”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作为人类共同体般的存在。

女性身份困境的最大阻拦是社会文化系统对男性的意识形态偏向，它在长久的社会发展中形成，占有根深蒂固的地位，不可能顷刻间土崩瓦解。因此，女性身份认同和性别困局的打破，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尊重与平等观念的树立是打破性别偏见的利刃；女性意识觉醒与独立的经济能力是保障自身独立的基本条件；社会观念与认同是孕育平等意识的良好沃土；理解、包容和尊重是所有人必须学会的基本人性。

男女平等与男女平权并不是割裂与对立的，

没有一方压倒另一方之说，而是双方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女性不再为了外在的、强加的理由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真正遵从内心实现自我价值、满足自我需求。同样，身份塑造困境并不是女性的专属，男性的身份锁链同样存在，例如社会对男性充满男子气概的要求，一个完整的个体应该同时具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不是简单以气质区分个体差异，身份自由与平等的真谛是多样、包容与尊重。

综上，上述两部影片的女主人公尽管都深陷性别偏见的困境之中，但仍然尝试冲破层层阻隔不断挣扎反抗，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与抗争。每个女性个体都是鲜活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社会塑造的、想象中的身份角色，社会对“女人”的定义并不代表她们自己，女性群体应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色彩与思想。

影片的最后，问题似乎都得到了想象式的解决，这也是理想愿望对残酷现实的美好憧憬。值得庆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许多当代的年轻男性能够对女性面临的困境产生共情与理解，女性的地位也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但女性身份困境与认同的改变仍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经济独立、男性的尊重与理解以及社会风气与氛围的建构与改变。

[潘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1] 毛尖：《作为套路的善良》，《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841638，访问日期：2021年7月3日。